

海外華人的「落葉歸根」 和「落地生根」

- 樹爾門 (Franz Schurmann)

歷史學家總是想借鑒古今以測未來，華人在今天是推動全球型經濟的重要因素，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對之作出解釋並揭示箇中緣由，從而挑明其對未來所隱含的意義。

在美國，常會看到汽車後面貼有「心懷全球，立足本地」(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的標籤，這種思想源自環保主義思潮。環保份子認為，現代工業文明正戕害着地球，他們的使命就是傳遞這個訊息，並努力使每一個人都如此相信，而每一個新的環保主義信徒更要身體力行，以阻止人類對自然的踐踏。

我們如果把這句標語倒過來，讀成「足遍全球，心繫本位」(act globally, think locally)，不單可以解釋華人近年為何在日益膨脹的全球型經濟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甚或可以解釋自宋朝以降華人移民的行為模式。

「足遍全球，心繫本位」這句話的內涵，同環保份子的理念頗為不同。「心繫本位」意指人們把自身近便的東西（諸如家庭、社區、信仰、歷史、傳承等）視為人生至關重要的關懷，而不怎麼去管世界所發生的事。從今天的角度看，「足遍全球」即承認人們確實在龐大的全球型經濟中時刻互動，並將之視為當然，竭力推動；它

也意味着人們得走出去積極參與這一新的全球型文化，因為它同全球型經濟一樣，正在強勁擴展。

與此相對，大部分環保份子視全球型經濟為危害地球的主因。他們要遏制、阻止它的發展，甚至要把它徹底鏟除。假如說他們全都敵視全球型文化，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超級大商場文化和跨國公司一樣可憎。因此，許多環保份子倡導回歸自然的新文化。

我並不是說環保份子和華人之間有甚麼分歧或敵意，這根本是兩碼子事。我只是想借用這句變通過的環保口號，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海外華人的歷史。歷史學家總是想借鑒古今以測未來，華人在今天是推動全球型經濟的重要因素，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對之作出解釋並揭示箇中緣由，從而挑明其對未來所隱含的意義。

從最近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所公布的一些數據中，我們可以領略全球型經濟的巨大威力。僅去年，跨國公司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暴升40%，達

到3,150億美元。39,000家跨國公司(共擁有27萬家外國子公司)的總資產高達2.7萬億美元^①。

華人在此龐大的跨國經濟中舉足輕重，這一事實可以從類似的宏觀數據中看出。在去年全球3,15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中，中國(包括台灣和香港)佔了380億美元。世界各地華人(包括台灣和香港)共有5,700萬^②。再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報導，「新小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正在迅速趕超原先「四小龍」(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經濟實力^③。這七條龍都深深介入全球型經濟，當然，日本和中國也不例外。另一份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大會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的亞洲投資來源於亞洲資金。除日本以外，其比例從1980年的30%增至1993年的45%^④。

鑒於大量華人居住在東亞和東南亞，不難推斷幾乎所有這些華人的物質生活都同全球型經濟、特別是同跨國公司息息相關。事實上，大部分華人都處於這一最新階段的全球型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中心地位。

要證明這句倒用口號的前半部分「足遍全球」並不難。世界各地的國家型、區域型、地方型經濟都被捲入全球型經濟的巨大旋流，即使商業繁華區內的、甚至是離商業區好幾公里以外的小吃點，最終也是從世界經濟中獲利。世界上幾乎所有人，包括五千米西藏高原上的牧民，現在也都繫於全球型經濟之中。

自鴉片戰爭起，大批中國人遠走他鄉，四海謀生。到美國的華人由於受種族歧視，迫使他們只能從事三種行業：洗衣、餐館、雜貨店，這意味着他們得依賴地方型經濟。這種情況到70年代起了變化，原因不僅在於

政府採取比較開放的移民政策，也由於美國的經濟形態從過往的國家型經濟轉變成目前這種全球型經濟，越來越多的華人緊跟這一經濟趨勢而躋身於直接同全球型經濟相關的企業：電子、電腦、高科技、國際地產業、金融等領域。美國華人從以前全面依賴地方型經濟跳過國家型經濟直接投入跨國全球型經濟^⑤。隨着東亞經濟迅猛增長，越來越多華人成為全球型經濟最重要的地理區域——東亞和東南亞——的組成部分。

然而，要解釋保持「心繫本位」這一點則較困難。如果在全球型的行動中仍要保持本於地方型模式的心態觀念，那麼與那些在行為和觀念上都是全球型的人比起來豈不就處於劣勢了嗎？就拿是否懂英語——全球型經濟的主要語言——來說，我們可不可以想像有這麼一位華商，在全球型金融市場上進行億萬元計的交易卻不懂英語？雖然我個人不認識這麼一個人，可我一點也不難想像有這樣一位華人商家，他雖不懂英語卻可在全球型經濟中如魚得水，運用自如。我也更容易想像同樣一位華商，英語說得很流利，可在其他方面的行為方式則是地方型的，甚至是相當狹隘的。

香港中華基金會創辦人胡國亨特別關注「全球型文化和民族國家意識」的問題。他不相信會出現徹底全球化的世界經濟，因而也認為不可能形成全球型文化。相反，他認為中國要在全球型經濟中有效運作，必需營造具有某種不卑不亢的民族國家意識的文化^⑥。

國家型是處於全球型和地方型之間的一個層次。許多年來，未來學家一直在預測民族國家的消退。然而，確如胡先生指出，民族主義正在上

華人在龐大的跨國經濟中舉足輕重，在去年全球3,15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中，中國(包括台灣和香港)佔了380億美元。由此不難推斷，幾乎所有這些華人的物質生活都同全球型經濟、特別是同跨國公司息息相關。

升，而不是消退。特別在亞洲，成功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由強勢政權統領（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我們無法簡單地忽略民族國家。民族主義，不管是好是壞，都是一個事實。

中華民族主義日益上升，這不僅在中國大陸，而且在台灣和香港都很明顯（比如有關釣魚島問題的激情）。而在整個華文傳播媒介，不管其政治傾向如何，中華民族自豪感也都顯然一致。東亞和東南亞其他地方，諸如南北韓、日本、越南、柬埔寨、緬甸、印度尼西亞，新民族主義也都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在東亞、東南亞以及世界各地，經濟和文化的疆界正在迅速瓦解，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個過程還會加速，因為區域間資本投資現已超過外來投資量（主要指北美和西歐）^⑦，這意味着區域間商人（當然不限於華人）的關係網將更為密切。英語已成為通用商業交流語言。全球型文化在青年人中尤具魅力。大酒店也如雨後春筍般一座座拔地而起。觀光客來自東亞、東南亞各個民族。許多觀察家都在預測97回歸後大陸對香港會產生甚麼影響。可是隨着舊疆界的廢棄，香港對中國大陸又會產生甚麼影響呢？

胡國亨先生認為民族主義在中國和東亞以及世界各地都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當然沒錯。但我認為用民族主義來取代「足遍全球，心繫本位」，卻無法解釋華人在迅猛增長的全球型經濟中如魚得水、成效非凡的表現。我贊同王賡武教授的主張，即強調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延續性及中華文化根結是促使華人在今天有如

此突出表現的主因^⑧。民族主義只是一個現代政治態度，它起源於1789年的法國革命，隨着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來到東亞，到上世紀末便波及中國。王賡武所強調的文化的根，要比民族主義的根深遠得多。

儘管民族主義的根比不上文化的根，但歷史已證明它既可以是團結也可以是分裂的強大因素。它團結本民族，卻分裂不同民族，特別是歷史上與本民族有利益和價值衝突的他民族。在國際關係上我們無法忽視民族主義的力量，但在歷史上有另一個概念和民族主義同時產生，即國籍，它卻僅起強大的融合作用。一國公民是指那些鑒於理性而不是基於文化或血統，決定加入某一政治共同體的人士。所有國家都允許外國人成為其公民，雖然許多國家會附加種種條件。新的公民得宣誓效忠、接受國家義務，同時也享受政治權利。

對許多華人來說，入籍既使他們成為居住國忠實守法的公民，同時也使他們得以「足遍全球，心繫本位」。他們對國籍問題處之泰然，因為這是理性的選擇。而對抵抗性民族主義的挑戰則頗難處理，因為它涉入許多情感因素，往往要求作出「你站在我們一邊，還是站在我們對面」的選擇。

要探討華人的「心繫本位」意指甚麼，或許我們可以先分析世界銀行主席沃爾芬申（James Wolfensohn）最近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集會上，就東亞發展成功發表的談話。他具體針對新加坡的情況，同時也在普泛意義上指出東亞的成功是因為有「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促進鄉村發展計劃，以及在教育和保健方面的大量投資」^⑨。亞洲觀察家對沃爾芬申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三項都不會感到驚奇，因

胡國亨先生認為民族主義在中國和東亞以及世界各地都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當然沒錯。但我認為用民族主義來取代「足遍全球，心繫本位」，卻無法解釋華人在迅猛增長的全球型經濟中如魚得水、成效非凡的表現。

為實際的發展政策、重視保健和教育都是以儒家價值運作的強勢政體的標誌。但他指出的鄉村發展政策則需要進一步解釋。

令人驚訝的是，在新加坡這塊彈丸之地，居然還有興旺的農業，能滿足大部分新加坡人的糧食（包括肉類）需要。「聯合國發展計劃」最近發表了一份對世界上所有城市農業的調查報告，其中特別稱讚新加坡的農業成就^⑩。李光耀資政對新加坡的重建，儒家的道德因素顯然起了作用，而農業則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孔子的教誨以及幾乎所有中國哲學思想，都堅信理想的、可行的社會結構（家庭和社區）應是鄉村型的。世界上第一位民主哲學家孟子就強調「民本」，這裏所講的「民」當然是指農民^⑪。

我們還應注意到，在東亞和東南亞兩巨龍和七小龍中，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都經歷過土地改革，此後小農得以保存，而沒有被大型農業商業公司所吞滅。而印度尼西亞，可能更由於大量農業人口而不是政策因素，現仍有大規模小農階級。更奇特的是，香港也有相當數量的小農。越南現正迅速開始工業化和現代化，同時也在共產政權下進行重大土地改革，但小農仍佔全國人口的絕對多數。

有一天我走在舊金山的「中國城」，我突然意識到，那些狹小的里弄就像我多年前在香港新界地區見到的圍村一樣。我清楚美國「中國城」裏的貧困和心理窘境，但家庭和社區觀念在那兒卻很牢固。我也知道有許多非華人走進「中國城」後便深深嘆息，想着要是他們也有華人那樣強的家庭和社區意識，那該多好。

我突然回憶起50年代在日本京都

大學研習中國經濟史的情境，那時我曾研讀東京大學已故著名教授仁井田升的著作。像大多數他那個時代（他就讀於30年代）的日本和中國社會科學家一樣，他是位馬克思主義者。正如我的同事和朋友北京大學的董正華教授指出，馬克思曾預言小農場、農民和村莊會被融入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文明中而日漸消失。董教授不贊同這一點，並用大量研究表明，小農在南韓和台灣這些高度現代化的地方都能繼續生存。現在他正在研究河南類似的現象^⑫。仁井田升則對另一個歷史現象特感興趣，即「會」，它跟鄉村和城市的關係有關。

他把中國的這些「會」的淵源追溯到宋朝，它們的形式同西歐的行會類似，但歐洲的行會和鄉村卻沒有任何聯繫。農奴制在鄉村裏盛行，而城鎮則是自由的地方。按當時法國和德國的慣例，農奴只要在城市裏能生存一年便獲自由，用當時流行的話說：「城市的空氣令你自由。」但對中國的「會」來說，村和鎮卻至關重要。人、貨都來自村裏，而「會」和這些村都有宗姓聯繫。人、貨都回流，其實就是一個來來往往的聯繫。仁井田升教授對這些「會」的堅韌持久性甚為驚嘆。尤其在中國北方，許多「會」一直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最近當我走進舊金山的「中國城」回憶起四十年前的學生生涯時，我突然覺得，「中國城」既是「城」也是「村」。事實上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國城」一直是唯一能將村和城市的傳統融合一體的成功例子。這一成功的內力可以證諸：好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人及中華文明所到之處，類似「中國城」那樣的城市型態都得以生存。我意識到舊金山「中國城」的歷史

「中國城」既是「城」也是「村」。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國城」一直是唯一能將村和城市的傳統融合一體的成功例子。這可證諸好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人及中華文明所到之處，類似「中國城」那樣的城市型態都得以生存。

本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認為，社會最終要代替社區，這是一個進化過程。但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延續性，卻暗示了社區和社會可以共存共榮。

家庭、社區、歷史、信仰和傳承都是人們自我界定的歷史源泉，海外中國人覺得「葉落」時便要「歸根」。這樣，流民不管是生或死，都固守家庭、社區、歷史、信仰和傳承。

不僅起源於1849年的淘金熱，而且起源於宋朝或更早。

任何社會學家都知道，大城市裏的社會關係不同於小鎮或農村。柏克萊加州大學費希爾 (Claude Fischer) 就此問題作過廣泛調查，結論是兩地的聯繫類型確實相悖。在農村，人們按家庭、鄰居和教堂聯結；在大城市，人們則以「夥伴」(associates)、「朋友」結交。城市是個人的天地，而不是社區的場所，其中只有社交網或「關係」，而無裙帶 (bonds)。費希爾的研究印證了本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的想法。滕尼斯將鄉村的聯結類型稱作「社區」(community)，而將城市的聯結類型稱作「社會」(society)。滕尼斯認為社會最終要代替社區，這是一個進化過程。但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延續性，卻暗示了社區和社會可以共存共榮。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在今天超工業化、超現代化、超城市化的環境下，這種傳承仍能延續下去。



我上面提到，「心繫本位」意味著把家庭、社區、歷史、信仰和傳承放在首要位置。如果農村比城市更能保存家庭，那麼把家庭放在首要地位就意味着把作為價值、觀念和現實的鄉村織入家庭生活。鄉村是社區的古典本位，在鄉村是由「我們」作主導，而在城市由「我」作主導。友誼是儒家五大倫理裙帶之一，只有當友誼被當作一種裙帶而不只是一種關係，才有社區。「歷史」(history) 在英文字面上講就是「故事」(stories)。在世界各地，村莊就是老人講故事——講他們的過去以及悠遠傳說的地方^⑬。信仰就是宗教。歷史上，村莊一直是信仰的腹地，而且當宗教勢力在城、鎮興起時，往往本來都是農民信仰者的先驅。在中國，我們只要看看漢末的黃巾起義、元末的紅巾起義和清末的太平軍就可得證。

也許最重要的是傳承。一個人是通過「我們」而不是「我」得到傳承的，這意味着前有祖先後有子嗣，因而在村裏拜墳崇子絕非偶然。

家庭、社區、歷史、信仰和傳承都是人們自我界定的歷史源泉。從歷史上看，只有村最能體現這些價值。在現代，中國人走向海外，他們當中大部分人 (其實幾乎所有人) 起初都信奉這些價值。「葉落」時便要「歸根」，「歸根」往往是指流落在外者真地要把遺體運回老家的村裏。這樣，流民不管是生或死，都固守家庭、社區、歷史、信仰和傳承。

但同其他流向城市的移民一樣，華人移民馬上發現，城市發展越快，則鄉村離他們越遠，而他們居住的國家和他們的切身利益關係也變得越來越密切。按最近聯合國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第一屆居所會議的預測，到

2000年世界上將有一半人口住在城市，而到2020年則增長至三分之二。城市化意味着工業化和現代化。無論世界各國的經濟和文化疆界如何迅速瓦解，政治邊界還會在相當長時期內壁壘分明。既然國家勢力仍強，民族感亦將如此。

在世界各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到處都出現移民問題。在某些地區，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揚言要驅除、甚至殺戮移民。抵抗運動也應運而生，支持者力圖用大量數據和分析來證明移民有極大的經濟用途，他們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雖然這場爭論不可能馬上收場，但同時也產生了另一個不同的中介聲音，即一個國家可以是——而且在現代環境下要生存和發展也必須是——多民族多元文化。

這一觀念實際上要求疆界分明的國家融入多民族多元文化主義之中。試舉美國為例。所有土生和歸化的公民都是美國這個國家的一部分，我們都成了美國人。雖然早先不太可能，但現在要成為並繼續做美國人並不需要懂多少英語。或者，有些人能說流利英語，甚至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但他們仍然遵循某個與美國主流文化相異的文化。其實美國文化本身也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用英語的文化。這種新的「多元」概念包涵了存在於美國內的不同文化，而美國人主要是通過公民身分聯繫在一起。

華人中也產生了另一個概念，即「落地生根」。它意指華人不僅決定成為新家園的公民，而且亦是所在國的成員。當然，假如再次出現極端排外性民族主義，他們將會同其他移民一樣，又得面臨被歧視甚至更壞的後果。另一方面，假如多民族多元文化

觀念得以普及，那麼「落地生根」的理想便可成為現實。

如果全球型經濟像現在這樣發展下去，各種疆界不斷瓦解，那麼民族國家要能繼續生存，唯一的道路便是引進並實行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政策。不如此，便得面對兩個死胡同的極端選擇：要麼奉行摧毀新的全球型秩序的極端排外性民族主義，要麼選擇被胡國亨先生認為行不通的放任型全球主義。

但是不管各國怎麼選，它們都不應該犧牲歷史所提供的最佳準則。例如基督教會早期不僅採用「新約」，同時也採用了猶太聖經的「舊約」。兩千年來，基督教的家庭、社區、歷史、信仰和傳承價值既依賴於新的基督教價值，也有賴於古老的猶太教價值。在這兩個傳統中，鄉村比城市更能肩負人們的價值依歸。

如果這些見解有用的話，那麼研究者就得考察華人城市以及鄉村方面的現象。我相信董正華教授之所以着重研究河南的鄉村，是因為他看到小農不僅僅是農業勞動力或剩餘勞動力，而且他們對整個中國歷史，包括城市和鄉村，都至關重要。他在1996年9月於桑給巴爾舉行的南南會議上宣讀的論文中提及河南某些鄉村的「新傳統」精神。他所謂的「新傳統」，是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家在其「黃金時代」（50年代早期和中期）所顯示的道德力量^⑩。

說到這裏，我有一些隨想。美國有兩大「中國城」：舊金山和曼哈頓。兩者都同超級大商業中心鱗次櫛比，舊金山的Montgomery街和曼哈頓的華爾街已有悠久的歷史。事實上，今天舊金山「中國城」的位置與1850年代初建時無異，那時Montgomery街只是一個碼頭，而如今已變成連綿一公里的

華人「落地生根」的概念，意指華人不僅決定成為新家園的公民，而且亦是所在國的成員。但只有多民族多元文化觀念普及，「落地生根」的理想才可成為現實。

商業繁華區。為甚麼兩者都能擋住財閥集統，而別的地方則不行？為甚麼「中國城」內那些像廣東圍村似的兩層簡陋磚瓦房，竟能在美國銀行那巨型建築陰影下生存至今？或許答案在於華人的小農道德能量，它已經織入那些簡陋建築物的磚瓦之中。

註釋

①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6年9月26日。

②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cited 28 March 1996); available from bpaubl@indiana.edu.

③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6年3月28日。

④⑦ Worldlink，1995年9/10月。

⑤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392、437。

⑥ Henry K.H. Woo,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Mind: Intellect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Hong Kong: China Foundation, 1993), 195-212.

⑧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⑨ 《聯合早報》(新加坡)，1996年10月3日。

⑩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rban Agriculture* (New York, 1996), 34-36.

⑪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和孟子(公元前380-289)差不多同代，但對民主的看法卻很不同。亞氏視民主為暴民統治，這一觀點在西方世界直到本世紀才改變。幾十年前，美國的共和黨人仍一直堅持美國是共和體，而不是民主制。即使今天，西方某些最積極地提倡民主的人士，發覺在日常生活中仍很難和普通大眾交往。相反，中國士大夫兩千年來總是跟農村和城市的「老百姓」打成一片。

⑫ 董正華：〈近現代東亞土地制度演變的基本軌迹——從地主所有制到現代小農制〉，《亞非研究》(北京)，1996年號；〈現代小農業的歷史地位對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有關討論的回顧〉，《北大史學》，1995年第3輯。

⑬ 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文明衝突」——村與城之間的衝突，這中間最強大的武器是電子媒介。即使電子媒介講述一個文化最偉大的傳說，它也必然破壞講故事所必備的人情親密感。在印度，成千上萬的村民現在每晚都圍在錄像機前觀看現代或古典的室內情景劇。印度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包括種姓等級制)將因此而崩潰呢，還是會倖免於現代化的影響？在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是鄉鎮企業，它力圖使「工、商、農」融為一體。我覺得中國現正進行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實驗，探究鄉村和城市生活這兩種互為衝突的觀念是否能有機地協調為一體。該實驗朝哪個方向發展，對整個世界(包括美國)都有重大意義。

⑭ 董正華：〈市場化而非私有化的發展——南街經驗的新模式〉，1996年9月宣讀於桑給巴爾南南會議。

錢鎖橋 譯

樹爾門(Franz Schurmann) 1951年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歷史學博士，1958-1994年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和歷史系任教；1970年創辦「太平洋新聞社」(Pacific News Service)，現任該社編輯；主要著述有：*American Soul,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Richard Nixo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The Mongols of Afghanista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uan Dynasty.*